



当代学术文丛



留学欧美以及回国初期的罗家伦
清华大学时期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罗家伦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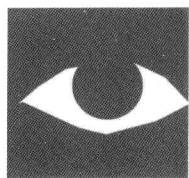
Luojialun De Jiaoyu Sixiang Ji Shijian

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孟丹青/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Luojialun De Jiaoyu Sixiang Ji Shijian

孟丹青/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 孟丹青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10-05767-3

I. ①罗… II. ①孟… III. ①罗家伦(1897~1969)—

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6828 号

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作 者: 孟丹青

责任编辑: 徐明德 陈 骥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965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01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aph.com

E-mail: xmd66@126.com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50 千

ISBN 978-7-210-05767-3

赣版权登字—01—2012—5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36.00 元

承 印 厂: 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罗家伦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	15
第一节 蔡元培教育思想对罗家伦的影响	15
第二节 《新潮》时期罗家伦的思想	32
第三节 “五四”运动对罗家伦的影响	51
第二章 留学欧美以及回国初期的罗家伦	64
第一节 在“社会的兴趣”和“学术的兴趣” 之间徘徊	64
第二节 对中央党务学校的治理	71
第三节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	76
第三章 清华大学时期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91
第一节 学术独立是民族独立的基础	91
第二节 重视教师聘任及学术研究	102
第三节 重视校风建设与大学生培养	117
第四节 重视图书仪器等基础设施建设	127
第五节 坚持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	134
第六节 争取清华基金独立和“改隶废董”	142

第七节 离开清华大学的原因	—— 150
第四章 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 174
第一节 大学的使命是“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 174
第二节 “诚朴雄伟”的校风建设及大学生培养	—— 186
第三节 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 193
第四节 加强学科建设,注重服务社会	—— 201
第五节 抗战时期坚持大学的生存与发展	—— 207
第六节 离开中央大学的原因	—— 222
第五章 尾 论	—— 231
第一节 罗家伦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情结	—— 231
第二节 “强者”的“新人生观”	—— 252
第三节 德国古典大学观对罗家伦教育思想的影响	—— 271
主要参考文献	—— 287
后记	—— 293

绪 论

大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学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把中国大学的历史上溯至夏商时期,比如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第一章就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毛礼锐作的序中也肯定“中国大学教育有几千年的发展脉络和经验”^①,认为汉武帝时期创办的太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正规大学。这样就模糊了普通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内涵。他们认为《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等古典文献中已经提到了“大学”,所以中国大学教育源远流长,有着悠久历史。

虽然中国古代确实有“建国之民,教学为先”的悠久传统,重视教育的道德教化与政治宣传作用,《礼记·学记》将各级学校概括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但是中国古代的大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中国晚清以前几千年的教育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教学内

^①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容,重视的是个人道德修养与政治伦理教化而不是探索科学真理和外部世界,没有健全的文理兼备的学科体系,缺乏大学自治和精神独立传统,显然不符合现代大学的要求。陈平原在《中国大学十讲》中指出:“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息息相关”,并且批评了认为中国大学有四千年历史的观点。^①

“大学”(University)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具有行会性质的由学者组成的社团。雅克·韦尔热在《中世纪大学》中说:“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大学同时由‘studium’和‘universitas’表示。‘studium’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universitas’表示行会组织,它保证高等教育的自治并行使其功能。在高等教育机构的生活中,行会组织为基础和首要的现实。行会组织并不一定按照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同活动划分成组,但却控制其全部。”^②博伊德和金指出:“按‘大学’一词的原意,只不过是為了互助和保护的目的,仿照手艺人行会(gilds)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或协会)。”^③美国的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本质上是做学问的场所,它致力于知识的保存、系统化知识的增加和大学生的培养。”^④

教育学家王家通认为:“今天世界上现存的大学中,历史最长的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十一、二世纪之间。在此期间,一些大主教堂所设立的学校逐渐制度化而成为研究学问的中心。学者们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乃沿袭当时手工行会(craft guilds)制度,由一群教师或学生,组成一种同业公会(guilds),而使用拉丁语的universitates(universitas)一字代表其团体。其意义根据史家拉胥多尔(Rashdall)的看法,乃是代表多数人的一种集团;与工

① 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法]雅克·韦尔热著,王晓辉译:《中世纪大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③ [英]博伊德、金合著,任宝祥等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④ [美]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商行会制度一样,它们是教师的同业公会(*universitas magistrorum*)或学生的同业公会(*universitas scholarium*),其目的在于维持教学的水准及保护团体的利益。”^①

至于我国的大学机构,则诞生于晚清。“我国近代学制系于清朝末年,直接仿自日本,间接模仿欧洲制度。就高等教育而言,我国大学教育之雏形见于光绪二十一年盛宣怀禀请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设立的西学学堂及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奏请开办的南洋公学堂(上海),西学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种,肄业期间各为四年,盛氏自称: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堂……至光绪二十四年开办京师大学堂,因庚子之乱一度停办,至二十八年重行恢复。京师大学堂招收各省中学毕业生入预备科,三年后升入正科,同为三年毕业。京师大学堂毕业期限既已延长,其程度亦已提高,因被认为是我国真正大学教育之发轫。”^②

蔡元培对于大学的发展有着精确的认识,蔡元培在1930年发表的《大学教育》一文中指出:“欧洲大学,在拉丁原名,本为教者与学者之总会(*Universitat Magrotrorum et Scholarium*),其后演而为知识之总汇(*Universitat Iit-terarum*),而此后备国大学即取其总义为名。”他说:“吾国历史上本有一种大学,通称太学,最早谓之上庠,谓之辟雍,最后谓之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位,其组织亦颇似今之大学。”但“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欧洲最早之大学,为十二、十三世纪间在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诸国所设者;十四世纪以后,盛行于德语诸国,即专设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科者是也”。此时大学以培养牧师、律师、医师和数师等专业人才为己任。“拿破仑时代,曾以神学、法学、医学为养成教士、法吏、医生之所,因指文理科为养成中学以上教员之所……其保留中古时代教者与学者总会之旧制者,为英国之牛津、剑桥两大学。牛津由二十精舍(*Col-*

^① 王家通:《高等教育制度比较研究》,(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168页。

lege)组成,剑桥由十七精舍组成。每一精舍,均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生活之所。每一教员为若干学生之导师,示以为学之次第而监督之。学生于求学以外,尤须努力于交际与运动,以为养成绅士资格之训练。”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大学教育则是建立在中等学校以上的教育,“大学教育者,学生于中学毕业以后,所受更进一级之教育也”^①。

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最好的范式,离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制度还差一段距离。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况,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落后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在被李鸿章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情况下,晚清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改革。在教育方面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新式学堂,这时的学校注重学习西方的语言和军事,带有强烈的实用性,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教育近代化,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伴随着工业近代化的追求而起步的。”^②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进步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如果没有思想观念、文化、制度层面的变革,光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是不够的。维新派通过对中日两国的比较,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中国不是因为军队发达而是因为教育发达,思想上开始从“兵战”到“学战”的转变。在教育救国思潮中,教育的作用被片面夸大了,而使改革者忽视了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改革。

随着百日维新被镇压,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1905年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深刻地冲击了传统教育,推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转变,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旧式教育迅速被新式教育、新式学堂所取代,而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则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河。

①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3—595页。

②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雏形在晚清时期初步形成,“教育制度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发挥教育职能的所有机构组成的体系。一般而言,包括学校教育系统和校外教育机构。其中,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是国家教育制度的核心,由各级各类学校组成。近代学校制度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国民学校的出现及相应的公共教育制度的形成才逐步建立起来的”^①。新政伊始,清政府就任命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学制,并于1902年8月15日正式公布,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学校系统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农历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部学制虽然公布,但并未实施。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是1904年1月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农历癸卯年,故亦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初步进入了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确立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式。但《癸卯学制》带有较强的封建性,整部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纲,强调以儒家伦理道德陶冶培养学生的品行,要求所培养的人才以忠君尊孔为己任,自觉维护封建专制体制。主持学制制订的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明确强调:“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②

晚清教育改革和学制建设体现出向日本模仿的痕迹,在办学宗旨上把教育作为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把人当作国家利益的工具,强调忠君爱国,进行军事训练,带有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色彩。但是晚清教育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实绩,开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先河。“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女子教育的较大发展,使20世纪头10年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粗具雏形。作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体制,不再以培养少数仕宦之才为唯一宗旨,而以造就各类新式人才为目的;不再以儒学典

①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第255页。

② 朱有藏:《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籍为唯一教学内容,而代之以近代各门类知识的学习。体制的转型既是教育观念转变的结果,又在新的层次上促进了观念转变的深化,在体制转型和观念转变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近三百万新知识分子,则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①

1912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忠君尊孔的封建旧教育显然已经不适应新的民主共和政体需要,发展资产阶级新教育,培养共和国民,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1912年1月3日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在上任不久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观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以建设近代国家。他并且进一步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②民国教育以培养具有近代思想的共和公民为宗旨,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1912年9月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2年9月3日公布了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因为这一年是壬子年,又称《壬子学制》。接着,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及大学的有关法令规程,于1913年(农历癸丑年),将这些法令规程的内容与《壬子学制》相互补充,形成《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一直延续到1922年。

《壬子癸丑学制》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是以民主共和新政体为皈依,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把教育的基点放在培养共和新国民、养成完全之人格上,在教育方针、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方面都突破了传统封建教育的框架,体现了历史进步性。“忠君、尊孔”这两条最能体现封建传统教育特征的内容被取消,“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的民

①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第185页。

②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4、10页。

主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新时期的道德标准和取向。个体价值与个性解放日益受到重视,旧的传统价值观逐渐瓦解,大量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得以涌入,为20世纪20年代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922年11月1日公布的《壬戌学制》更多体现出对美国教育模式的学习。《壬戌学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以七项标准取代民初的教育宗旨。这七项标准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和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整个学制系统以六、三、三、四分段,即初等教育段6年(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中等教育段6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与中学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高等教育段4至6年。《壬戌学制》具有民主性、科学性、灵活性,体现出中国教育改革日趋成熟,并且由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转变。当然,由于政治环境的动荡,教育家的理想与蓝图并没有得到实现。

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政府确立了“三民主义”教育方针,致力于各级各类教育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制定了包括教育法、教育规程、课程标准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在高等教育方面,主要的法律法规有《专科学校组织法》《专科学校规程》《大学组织法》《学位授予法》《学位分级细则》《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等,比较完善的教育立法工作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大学内部行政管理中所体现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原则,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进入大学执教,教学科研成果斐然,共同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从而涌现出一批学风严谨、师资队伍优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大学。

在民国教育发展史中,罗家伦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实践者与管理者对中国大学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罗家伦,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1897年生于江西南昌,1969年12月25日因病在台湾去世。罗家伦学生时代即在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罗家伦先生是五四时代文学改革运动的

健将,是新文艺的创导人,也是新思想的启迪者”^①。他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在当时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和老师陈独秀、胡适等一起站在反封建、反专制文化的前列。他作为“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名重一时,“五四”运动这个名词还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1920年秋赴美国留学,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修历史与哲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秋离开美国,先后在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接着加入国民党,投身蒋介石麾下。参加过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深得蒋介石器重。1928年8月,年仅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8月至1941年9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后,受蒋介石的委派率考察团赴西南、西北等边疆各省考察党务及经济建设。1943年又受命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1947年任中华民国驻印度大使,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在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他是文学家、思想家,又是教育家、外交家、实干家。

罗家伦一生最有光彩和成就的当属他的教育事业,包括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务主任和在两所名牌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任校长,在他长达十几载的教育生涯中,他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切实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留下了一连串贡献社会、推动文明进步的足迹。

陈春生在《新文化的旗手——罗家伦传》中说:“纵观罗家伦先生的一生,吾人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生命,贡献给多难的国家。从他青年时代,领导五四运动开始,历经参加北伐战役,主持大学教育,著述演说,培养建国人才,以至担任新疆监察使,战后出使印度和主持党史会及国史馆,他毫无保留将他的心血浇灌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教育、社

^① 《学术界同声哀悼》,(台北)《中央日报》,1969年12月26日。

会各种建设,都发生深远的影响!后辈青年而关心国事者,对这样一位无私无我的爱国先贤,怎能没有认识呢?”^①

1969年,罗家伦逝世,蒋介石题颁“学渊绩懋”挽额。1970年8月,蒋介石又明令褒扬,对罗家伦的一生作了官方“盖棺论定”：“总统府国策顾问罗家伦,早岁负笈北京大学,当文学革新之会,乘时宣力,卓有声称。嗣留学美、英、法、德诸邦,勤苦深造。北伐之役,效力投艰,尔后迭长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为国育才,士林推重。三十二年,首任新疆监察使。抗战胜利后,历任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筹备会议代表、驻印度大使、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职,弘济艰虞,克彰绩效。行宪以来,膺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复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多士受其甄陶,文献勤于集录。综其生平,才识通敏,述作斐然,勋劳懋著,声华远播。兹闻病逝,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忠荃。”^②

罗家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情结,被认为“是书生报国爱国的典型”,他虽具有浓厚的政治热情,但并不是对“政治地位感到兴趣的人”,“他不是空发议论的书生,而是有治学及治事才能的学人”^③。

有学者把罗家伦称为近代中国的“歧路人”,但是罗家伦是不是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呢?作为蔡元培、胡适的得意门生,作为留学欧美六七年,系统地接受了中西方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罗家伦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文化有精深的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应该说是现代化的,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而不是封建保守落后的。他毕生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他的理想注定落空,成为一个梦。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梦,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梦。所以说罗家伦并非近代中国的歧路人,也不是蒋家王朝的“党棍”或“帮闲”,

① 陈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罗家伦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② 刘维开编著:《罗家伦先生年谱》,(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341页。

③ 《悼念罗家伦先生》,(台北)《大华晚报》,1969年12月27日。

不能因为他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就否定他所做的事功。他是一个具有先进现代化思想和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建设者和实干家。他追求的不是个人利益与权利,而是国家民族的进步,所以他可以忍受嘲笑与诬蔑,丝毫不讲情面,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或躲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而是行动者、实干家,不是用抽象的理论而是用具体的实践为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奠定了若干基础。

罗家伦并没有徘徊在“歧路”,他走的是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做的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事功。在中国历史上,向来议论他人是非的人很多,而做事的人很少。有的是不愿做,有的是没有能力做。只要做事,无论成败,下场大都不好,大多以悲剧收场。失败了自然遭人耻笑,黯然退场;成功了则得罪更多人,导致更大的妒恨和排挤,歪曲和误解。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都难逃历史的怪圈。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①所以聪明人往往不做事,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但自己不做事,而且不准别人做事,视做事的人为另类。

罗家伦在《新人生观·知识的责任》中批评过中国文人的“清谈”、“清议”之风,认为“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和表现。“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士,是最长于清谈的,最长于享受的。在魏晋南北朝是清谈,在以后蜕化而为清议。清谈清议是最不负责任的思想和表现……‘清议可畏’,真是可畏极了!横直自己不干,人家干总是可以说风凉话了。”^②清议的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不做事,都等着看别人笑话。

罗家伦认为:“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

① 《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② 罗家伦:《新人生观·知识的责任》,《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8页。

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即“知识的责任”。他重视力行,反对清议与空谈,他自己也饱受清议之苦。他在文章中说“清议可畏”,一是指“人言可畏”;更糟糕的是“清议”害事,贻误时机、没有担当。许多事情,一旦付诸“清议”,必然无法解决。罗家伦果断看似专断的行事风格可能也和他认为清议误事有关,他知道做任何事都少不了事后的众说纷纭,所以做任何事要有勇于任事的心理准备。他做事不讲人情,得罪很多人,最后成为牺牲品,不得不放弃自己大有作为的教育事业。

罗家伦的悲剧不是他依附政府当局,而是他企图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之外埋头苦干,一心做实事,最终要得罪权贵。他在一个不是建设的时代,而想做建设的事业,注定失败。罗家伦所做的是,并不是为了了一党一派而做的,也不是为反动政府帮忙或帮闲,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所做的。他所做的事皆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而不是反动落后的。与其说他是蒋家王朝的走狗,不如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忠臣。他一生所从事的思想文化教育事业,表面看借助了当局者力量,有“御用文人”色彩,但实际上远离政治、权利斗争,并没有多少党派、政治色彩。他治理下的大学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埋头做事的环境和条件,大学也不再是一方净土而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场所。所以不善于尔虞我诈、权利之争的罗家伦,虽然有当时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欣赏,也无奈得罪了太多其他当权人物,被排挤出局,空有一身才干也无法施展了。任何建设事业都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连蔡元培和胡适等都因为受政治力量和时代背景限制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何况罗家伦?从这一点讲,罗家伦从中国高等教育界黯然退场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与社会的悲剧。

罗家伦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现代化问题一直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他多次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走近代化的道路,

而近代化的实质就是科学化。“近代化这个名词,就是英文的 Modernization,就是摩登化。不过近来摩登(Modern)这个名词,被人用坏了,所以我此刻所讲的摩登化,与一般所谓摩登,毫无关系。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能够独立存在于现代世界上,就非经过近代化不可……要明白什么是近代化,必定先要知道什么是近代文明的特质。近代文明的特质就是科学,所以近代化,就可以说是科学化。西洋近一百年来,科学完成了种种重大的演化,使世界一切事物,莫不受他的支配。如物质生活受他支配,政治社会的组织,受他支配,乃至学术思想,也受他支配。这是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不受近代化的国家,在近代便无生存的余地。”^①

他相信,“中国现在的出路,以及一切改革的方针,都应该注重近代化。近代化即科学化之意。最近三百年内,各国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知识文化,都有变动,而考其来源,可以武断的说,即由于科学理论的推动”。“总括起来说,在中国今日,我们的物质环境,应以科学方法来改造,我们的社会组织,应以科学方法来组织管理,我们的思想生活,应以科学方法来支配统制。如此,一面才可以保存旧有的精华,一面才可以在现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否则只有落伍;所谓‘古今之道,无变古之术,殆矣’。希望大家从此都确立一个态度:即促进中国近代化、科学化。”^②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其中思想的现代化是基础。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具有现代化思想,也就是现代性理念,这是一种理性的觉醒和人自我力量的觉醒,“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是以对‘神’的反抗开始的;人把自己虚幻中观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坛,把人及理性放在了原来上帝的位置。原来以神圣天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和道德秩序,不得不让位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在这

① 罗家伦:《中国近代化问题》,《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六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版,第384页。

② 罗家伦:《中国近代化问题》,《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六册),第427、430页。